

文史苑

(一)



- 鲁迅在虹口
- 皖南胡氏与新闻界
- 陈布雷一家
- 破译密电码
- 上海西服业鼻祖——荣昌祥

5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用歷史知識

啓發教育後代

朱國恩來同志語

卢昉娟

前 言

为了使征集到的文史资料便于保存和交流，我会从1985年7月到1987年4月，共编印《文史资料汇编》油印本五集，另印发《活页文史资料》一期。总计选刊了质量较好的来稿51篇。其中有13篇先后为北京《人民政协报》、上海《联合时报》、香港《华人月刊》以及其它报刊所选刊、转载或选入单行本，我们在深受鼓舞之余，更感到工作上的不足，需要力求改进。

鉴于已印行的油印本在文字容量、印行数量及印刷质量上均受限制，特增出铅印本，取名《文史苑》，仍为不定期的内部资料刊物。

我们恳切希望各有关方面多加指导。承蒙赐稿，不胜欢迎。

政协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1987年11月

目 录

鲁迅在虹口	袁义勤 (1)
宋庆龄的虹口故居	本刊辑 (6)
虹口区文化史话之一	以 勤 (7)
李白烈士故居揭幕	刘同葆 (13)
访裘慧英同志	姜 烈 (16)
虹口区史迹采撷	本刊辑 (20)
五金业的发源地在虹口	卫元声 (26)
冯玉祥在美国	陈维姜 (33)
史量才遇难后收尸验尸经过	叶凤虎 (36)
陈布雷一家	张令澳 (43)
宋美龄慰问苏联红军	张令澳 (50)
破译密电码	邱沈钧 郑良佐 (55)
荣德生的记者招待会	钱可亨 (63)
戚再玉被杀内幕	沈立行 (67)
《大公报》在上海的崛起	丁君旬 (71)
回忆《世界晨报》	柯 震 (78)
皖南胡氏与新闻界	潘湛钧 (83)
《良友画报》与良友图书公司	张志康 (88)
淞沪抗战前夕《民国日报》何故停刊	以 勤 (90)
北平之行——赴华北大学学习的回忆	丁 芝 (94)

林则徐书札手稿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林维和 (101)
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个记者冯有真	潘湛钧 (103)
华侨学生在继光	赖纪云 (106)
麦伦中学与体兰馆	陈承融 (110)
江湾蔡氏 中医世家	本刊辑 (114)
徐重道国药号的经营之道	卫元声 (117)
上海西服业鼻祖——荣昌祥	王汝珍 (123)
虹口区政协简况	区政协办公室 (135)
虹口区民盟简史	徐焕才 梅士新 (148)

鲁迅在虹口

袁义勤

今年十月，是鲁迅先生定居上海60周年。“躲进小楼成一统”，是他七律《自嘲》中的一句。他自1927年10月来沪，至1936年秋逝世，先后寓居的“小楼”，都在虹口区。其间有过“三迁”，先居景云里，继迁北川公寓，后迁大陆新村。在这9年中，他曾经有过四次避难。

“景云深处是吾家”

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便由周建人代为赁屋于横浜路景云里。这是一条不大的里弄，一律石库门房子。鲁迅在景云里寓居两年半，也有过“小三迁”，初居23号，因邻近大兴坊，夜晚麻将牌声喧闹，无法握管构思，于是迁入18号，后来因隔壁一幢朝东有窗，阳光比较充足，又迁居17号。许广平在“景云深处是吾家”这篇文章中有过详细介绍。

在景云里时期，鲁迅除从事创作、译著，以及编辑《语丝》、《奔流》、《朝花》之外，参加了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左联”成立大会是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召开的，他出席了大会。会场在“中华艺术大学”离景云里虽只有百步之遥，却潜伏着千难万险。鲁迅正因参加“自由大同盟”与“左联”的活动，而遭到国民党的“秘密通缉”。1930年3月19日，鲁迅离家

暂住北四川路魏盛里内山完造家中避难，这是他在虹口区的第一次避难。在避难期间仍坚持写作，至4月19日方回寓所。回寓不久，鲁迅曾应李立三的邀约，由冯雪峰陪同往爵禄饭店与李晤面。据冯回忆：“谈话约四、五十分钟。李立三的目的是希望鲁迅发个宣言，以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当时住在景云里，回来后他说：‘今天我们是各人讲各人的。要我发表宣言很容易，可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期第83页）

火线下的北川公寓

1930年5月，鲁迅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从景云里17号迁居北四川路2093号北川公寓三楼四室。房间前窗临街，他在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时，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尽管是炎夏，也一直坐在离窗三尺远的里面，决不靠近窗户，以免路上行人抬头看到他。迁居四个多月后，鲁迅五十寿辰，上海左翼文艺工作者特为举办纪念会。为了防止意外事件，事先请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出面租借了荷兰西餐室作会场。

到1931年1月，“左联”作家柔石、殷夫等五人被捕时，鲁迅又在内山完造协助下，避难在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广平移居花园庄。”这是他在虹口区的第二次避难。在得知“左联”五烈士遇难后，鲁迅在极度悲愤中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此次避难历时39天，始回原寓。为了冲破白色恐怖的严重包围，鲁迅参与筹办了《前

哨》创刊号“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的刊名是他亲笔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与《柔石小传》也在本期中发表。

在北川公寓里，鲁迅的书桌是斜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一天正在写作，突然电灯全行熄灭，接着就隐隐听到枪声。“急退至楼下，……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92页）“一·二八事变”发生了。于是鲁迅不得不作第三次避难。他的全家和周建人一家共10人，挤在内山完造书店的一间楼上，后来又迁避于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及大江南饭店，至3月19日始回北川公寓。在此期间，鲁迅与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等43人签署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曾发表于《文艺新闻》“战时特刊”、《烽火》第2号及《申报》等报刊。因为鲁迅家在火线之下，有许多人关心他的安全，写信到《文艺新闻》探询，该刊曾在告读者中说：“……离开战区最后的是他，回去最早的也是他，现在他又回到旧寓了。”

这年的7月，鲁迅为准备写关于红军战斗业绩的中篇小说，而在北川公寓家中与陈赓秘密会见。当时陈因腿部负伤，从鄂豫皖根据地来上海治疗。他向鲁迅谈了红军的战斗，也谈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与文化建设，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曾说过：“要写，只能象《快流》似地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时，说“后因感到资料尚不十分熟悉，怕写不好而因此搁笔。”

1933年1月，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鲁迅被选为执行委员。面

对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鲁迅家中不便存放大量书籍。在即将迁入大陆新村的前夕，他在狄思威路（今深阳路）租了一个房间，存放马列主义著作及其他书籍。

大陆新村9号——万众瞻仰的故居

鲁迅在虹口区的第三次迁居，便是1933年4月迁入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这是他在上海最后的寓所。这次，他化名周裕斋，以内山书店职员名义租赁房屋。从此以后，他与外界的书信往来、邮件传递，几乎都托内山分店代转，连交付房租、水、电费等也由内山书店代办。大陆新村邻近千爱里，鲁迅曾经在这里举办版画展览会。他从家里楼窗前望到千爱里会场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便喜不自禁地又从寓所跑去照料一番。

白色恐怖还是有增无已，“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杨杏佛于这年6月中旬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据传鲁迅也在黑名单之列，但他置生死于度外，毅然亲往送殓，出门时连钥匙也不带。送殓回来，又作《悼杨铨》一首：“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年8月，国际反帝反战代表大会远东会议在上海秘密举行，鲁迅被推为会议主席团名誉主席，同时被推选的还有毛泽东、朱德、片山潜、高尔基、巴比塞、台尔曼等。次年8月，因内山书店某店员被捕，鲁迅不得不离开寓所，居千爱里暂避，至9月中旬回寓。这是鲁迅在虹口区的第四次避难。

1936年6月，鲁迅病情逐渐严重，仍撰述不辍。当时他本想往日本养病，且已着手看《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书，但终未成行。主要原因是宁愿离开战线。早在前一年，史沫

特莱等人曾力劝鲁迅出国休养，他就说过：“……自己这时还有一枚笔可用，不能洁身远去。”这年10月1日，他与郭沫若、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呼吁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并强烈要求言论自由。到临终前两天，据周建人回忆：“他又讲起要搬房子，并且非常坚决急迫地说：‘房子只要你替我看定好了，我就立刻搬，电灯没有也不要紧，搬进去后再办接火等手续。’这时中日关系渐趋紧张，鲁迅觉得住在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底不好。”但是不幸，未及迁居，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的巨人就与世长辞了。从此大陆新村9号成为万众瞻仰的故居。在二楼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中，墙上陈旧的日历停在10月19日，台上的旧钟指着上午5时25分。

宋庆龄的虹口故居

我区东余杭路530号四开间房屋和526弄23——31号四间房屋是原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之父宋嘉树先生（宋耀如）在沪的最早的产业。宋于1890年在这里购地营造，当年与倪桂珍女士结婚时就住在这里。这里也是宋氏三姐妹（蔼龄、庆龄、美龄）三兄弟（子文、子良、子安）的出生地，他们的幼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宋嘉树先生于1894年在这里结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曾在这里留宿，与宋通宵达旦地谈论并筹划反清起义的革命活动，宋在活动经费上给予了支持，从而成为后来孙先生组织并领导的兴中会的核心人物之一，负责保管兴中会会员名册和财产帐目，支持并协助孙先生从事革命活动近二十年。

宋庆龄女士和孙中山先生结婚后，1916年自日本返沪期间，曾一度在这里住过，他俩常常在下午四时以后乘坐马车在唐山路兜风，或去唐山路290号的教堂（今虹口区运输公司）做礼拜。

宋子安曾于抗战胜利后到这里来看过房子，说：“房屋保养得很好。”1986年前宋还托人来看过这里的房子。

（本刊据虹口区文化局资料摘录）

虹口区文化史话之一

以 勤

一、“左联”成立大会地点

——多伦路 145 号

进入多伦路145号大门，小小院落里有一幢六开间的两层楼房，东、西两座拱形门朝南并列着，有时传出阵阵的歌声，院前停着有红十字标记的救护车。这里现在是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托儿所与停车场，而在三十年代初，这里曾经是“左联”召开成立大会的地点。在西边一座拱形门侧的墙壁上，有1980年嵌立的石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地点——原中华艺术大学”。

关于“中华艺术大学”的校址，有过不同的说法。如许幸之同志曾经提出：“并非原先所说的四川北路多伦路（原赛乐安路）145号，而是现在的201弄1—2号”（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史稿》第82页）。经过有关方面考证，上面的说法被否定了，中华艺大的旧址确是多伦路145号。这是一所直接在党领导下创办的艺术专门学校，规模不大，由陈望道任校长，实际由教务长沈端先（夏衍）负责。任教者有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郑伯奇、王学文、沈起予、冯乃超、彭康等，学生大都是进步青年。当时中华艺

大实际上已逐渐成为上海学生运动与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据夏衍同志回忆，1929年秋，“左联”筹备工作积极进行，筹备小组的成员是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彭康、阳翰笙、钱杏村、蒋光慈、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夏衍，共十二人。筹备会的地点，经常是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馆二楼。潘汉年当时是中宣部直属的文化委员会书记，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时间与地点，是筹备小组商谈后由潘汉年决定的。时间是1930年3月2日，地点是中华艺术大学。这天是星期日，这个学校没有宿舍，学生都不在校。在前一天，即3月1日下午，潘汉年特地找了夏衍，还有戴平万和闸北区委的一位负责人，一同察看会场。从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的交界，到中华艺大二楼的进口处，直到全校的房间，都仔细进行了观察。有哪几个门可以出口，有没有后门，经过后门可以从哪条路出去，都作了周密的检查。潘汉年并叮嘱夏衍，事先对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开会时有紧急情况发生，他们两人要陪着鲁迅首先从后门撤退。

这次到会的人数，除正式出席会议的四、五十人之外，还有一些中华艺大的师生参加，总数至少有五、六十人。大会选出了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村、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执行委员。通过了“左联”纲领与行动纲领要点等提案。鲁迅等人作了演讲，由于时间限制，有几位预定发言的人来不及讲话，到傍晚就宣布散会。这次大会是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情况下秘密召开的。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

戏剧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等组织，也相继成立。这些组织有时也都以中华艺大为活动的基地。1930年4月，上海工部局在查封寰乐安路（今多伦路）12号上海艺术剧社时，中华艺术大学也遭到了抄查。

二、上海艺术剧社旧址

——多伦路12号

在三十年代的前夕，上海话剧运动已很活跃，北四川路曾被称为话剧运动的中心。艺术剧社（亦称上海艺术剧社）就是在1929年秋在北四川路成立的。它是党直接领导的，并且首先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戏剧这一口号。夏衍同志一开始就参加筹备，并成为剧社的中心人物。当时郑伯奇得到同乡帮助，在北四川路底永安里开了一爿文献书房，于是就由郑伯奇任社长，把剧社的社址暂设在文献书房的楼上。后来才迁到寰乐安路12号（今多伦路北四川菜场对过）。剧社成员有钱杏村、孟超、冯乃超、陶晶孙、叶沉、许幸之、石凌鹤、朱光、陈波儿、王莹、刘保罗、司徒慧敏、吴印咸、侯鲁史、唐曙初等。

排戏的地点，是在北四川路余庆坊的一家楼下客堂间。演员来自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四川各省，普通话讲得不够标准。所以夏衍曾戏作一联：“两间东倒西歪屋，一簇南腔北调人。”上联有夸张，下联是写实。排戏的时候，也是商量筹款、计划推销戏票的时候。当时演戏，不仅剧团要筹款预备赔本，演员与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自理车费、伙食的。

该社曾举行过两次公演，第一次公演的剧目，是德国米尔顿的《炭坑夫》（即《矿工》），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第二次公演的剧目，是冯乃超创作的独幕剧《阿珍》，与从德国小说家雷马克原作改编的《西线无战事》。在上演《西线无战事》时，还遇到舞台换景的问题，为了解决三小时内换十一堂景困难，特地租用了日本人经营的“上海演艺馆”（在四川北路横浜桥，现“永安电影院”院址），这里有转台的装置。

上海艺术剧社的两次公演，对话剧运动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第二次公演后不久，在1930年4月28日晚间，该社就遭到上海工部局的查封。

三、景云里

——虹口区的“历史文化名里”

在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现在虹口区横浜路的“景云里”，曾经一度是文化人寓所的荟萃之地。叶圣陶、周建人、茅盾、鲁迅、冯雪峰、柔石曾经寓居于此，陈独秀也在景云里有过一宿之缘。

这小小的弄堂，因为邻近宝山路，离商务印书馆不远，曾以“商务”有些职员住在这里。叶圣陶、周建人二人当时在“商务”担任编辑工作，茅盾也曾经在“商务”任职多年。当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于1927年8月从牯岭回到上海时，他的家就住在景云里11号（丙）。叶圣陶住在茅盾家隔壁，周建人住在叶圣陶家的隔壁。

其时，茅盾遭受通缉，不得不隐居在家中三楼，从事创作。叶圣陶则在编《小说月报》，于是茅盾创作的作品，就通过叶在《小说月报》与《文学周报》上刊登。茅盾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就是在景云里写成的。在发表这部作品时，他第一次用了笔名“矛盾”，那“草头（廿）”是编者叶圣陶加上去的。因为叶考虑到“矛盾”一看就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编者就很是为难。据茅盾同志回忆，1928年6月底，一天夜间，陈独秀突然来到景云里，为了要撰写一部《文字学注释》，而来与茅盾探讨上海话的古音。因陈也是通缉对象，当时里弄内乘凉人多，不便回去，就在茅盾家住了一夜，次日清早离去。所以陈独秀与景云里结下了一宿之缘。不久，茅盾东渡日本，他隐居的三楼便空出来，由冯雪峰居住。冯当时从事秘密工作，没有收入，住房是免费供应的。

鲁迅赁居景云里，则是由于周建人的引介。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曾下榻共和旅店，由周建人接往景云里23号。这23号的前门，正对着茅盾家的后门。鲁迅寓居景云里，曾有“三迁”。最初迁入23号，继迁18号，后迁17号。海婴出世，即在景云里。在给孩子名取时，鲁迅说：

“因为是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在景云里时期，鲁迅于从事创作、译著之外，还编辑了《语丝》、《奔流》（与郁达夫合编）、《朝花》月刊及旬刊（与柔石等合编）。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沪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同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出席了成立大会，会场就在窦乐安路（今多伦路）145号中华艺术大学，离景云里不过百步之遥，大会是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召开的。正因为参加了“自由大同盟”与“左联”等活

动，鲁迅遭到国民党的“秘密通缉”，而不得不于1930年3月中旬离家，暂住北四川路魏盛里内山完造家中避难，整整一个月始返回景云里寓所。这是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在上海的第一次避难。同年5月，他从景云里17号移居北四川路北川公寓。

柔石在景云里的寓所，就是鲁迅住过的23号。他当时曾由鲁迅介绍，接编过半年《语丝》周刊。除了创作与译著，他的主要精力曾经花在《朝花》上。他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

上海是历史文化名城，景云里也可算是“历史文化名里”了。